

# 本尼特： 文化与社会

[英] 托尼·本尼特 著

王杰、强东红等 译

柏敬泽 校

● 视像·媒介·文化权力丛书 金惠敏 张云鹏 主编

► 国家“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资金资助

# 本尼特： 文化与社会

[英] 托尼·本尼特 著

王杰、强东红等 译

柏敬泽 校

视像·媒介·文化权力丛书  
主编 金惠敏 张云鹏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尼特：文化与社会 / (英) 本尼特著；王杰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视像·媒介·文化权力丛书 / 金惠敏，张云鹏主编)  
ISBN 978-7-5633-7117-4

I. 本… II. ①本…②王… III. 文化社会学—文集  
IV. G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37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  
(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25 字数：370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3 000 册 定价：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丛书总序

当威廉斯把“文化”人类学界定为“生活方式”，而且是既包括了知识的和精神的也包括了物质的等“全部的生活方式”时，在他的关键词中，“文化”与“社会”其实就已经是比邻而居了。社会尽管需要一定的物质支撑，如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但物质不会自动地向人生成，唯其借助于人化的作用，方可成为社会性的，社会中的物质性于是就只能是社会化了的物质，归属于社会这个有机体。就此而言，“社会”本来就是“文化”的另一称谓，而所谓的“经济基础”也不过是“上层建筑”的物化形态。

但应进一步指出，由上层建筑所实现的经济基础的文化性仅仅是它的一些被意识到了的和可实际操作的层面。作为一种“生活”之方式的文化，总是有无意识的事物“自在”于那儿。文化因而甚至不能被简单地说成是有意为之，不能是文人雅士们的单方面创造，不能是智识的或精神的“所思所言之精华”。一种文化的形成最终将经由“社会”的接受和践行。文化从来且永远是全社会的文化，是大众的文化。这也就是说，“文化”即“社会”，即“物质”。

更早在19世纪末，齐美尔就敏锐地捕捉到“文化”与“社会”的同一性。他以“货币”为例展示了作为现代社会本质特性的符号化和审美化的过程。在他看来，现代性就是距离化、抽象化和升华，一种新的间接性，因而现代性

就是“审美现代性”，主要地说，是“社会的审美现代性”，诚然，他也不曾排除“艺术的审美现代性”。当今，社会学家费瑟斯通和鲍德里亚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文学批评家杰姆逊以“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也有贝尔诸公以“后工业社会”，科学界以“服务科学”的概念，等等，揭示了文化的泛化及其对社会的再组织和再构造作用。尽管未必直言，在这些对文化的泛化即大众性和物质性（如日常生活）的聚焦中，也是隐含着“文化”即“社会”这另一方面的道理的。

或许我们可以不去理会这些西方人的危言耸听，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个坚硬而显著的事实是，“文化”愈益“社会化”，而“社会”也愈益“文化化”，换言之，文化的成了社会的，而社会的也成了文化的，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已然无法拒绝。当前文化研究之所以在中国、在全世界蓬勃发展，正是因应了一个“文化社会”或一个“社会文化”的出现。

必也正乎名，今日文化研究并不等于反过来说研究文化，甚至也不只是研究大众文化——虽然那一直就是它的题中要义——而是文化地研究：研究什么并不是不重要，但更关键的是以文化的方式去研究。这就是威廉斯那个“文化”定义的真谛，即把“文化”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指意系统，一种社会实践。因此，文化研究就可能成为消费社会的一种意义政治学，一种社会美学，一种被更新了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国的文化研究将既不是英国文化研究，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而是一种新的综合和超越。

我们的场域自然有限——视像，媒介，文化权力；而且，编辑一套以译著为主的丛书，于那重建消费社会的批判理论之大任似乎亦显得绠短汲深。但我们仍固执地奢望一种或然性的出现：通过对那些核心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前贤智慧的温习、再温习，通过与国际同行的切磋，丛书将推助一些有心者看到和逐渐地逼近这一目标，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可望变得可及。退一步，至少于眼下说，它可以为我们理解纷纭万象的当代生活提供一些积极的透视角度。而果能于此，则就是千里之行已发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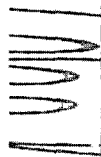
最后，序成之际，丛书承蒙设立于百年学府河南大学的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之批准，列为其重大项目。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这项事业不再孤单，忧我等学浅德薄，将何以堪此重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惕惕以为序，自勉，亦与同好者共勉。

金惠敏 张云鹏



托尼·本尼特是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中心(CRESC)主任,澳大利亚人文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交流学院兼职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托尼·本尼特即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之一。1983年至1998年他受聘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任人文学院院长,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托尼·本尼特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有很大影响,使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内对文化研究的引入和展开,托尼·本尼特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据我所知,托尼·本尼特与格罗斯博格(Lawrence Grossberg)共同主编的《新关键词——重新修订的关于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表》、托尼的早期代表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90年代的代表作《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和政治》都在译介过程中。托尼·本尼特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他对文化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看来,托尼·本尼特的学术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等文化的社会作用,对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都作



出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和贡献,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理念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认真研究的地方。

从现象上看,托尼·本尼特的特殊之处首先在于他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文学问题和艺术现象的。托尼·本尼特1947年出生于英国,大学阶段在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此后在苏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研究生,研究兴趣集中在艺术和文学社会学,博士论文主要研究乔治·卢卡奇的思想,特别是卢卡奇关于现实主义思想和阶级意识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初期,托尼·本尼特开始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工作,并在那里结识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第一代著名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1975年,转入开放大学工作,任讲师并于1978年开始负责开设开放大学的“大众文化”课程,由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托尼的成名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出版于1979年,是继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在英国学术界出版的受路易·阿尔都塞影响的重要学术著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美学的角度思考和回应了路易·阿尔都塞所提出的著名问题: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托尼·本尼特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实质上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和各种后康德式美学的思想和理论。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理论上的对立,马克思主义要求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文学、艺术等重要的文化现象,而形式主义美学为了强调文学性的重要性而主张割断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丰富联系,仅仅从自律性形式层面分析文学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形式主义和各种后康德式美学不可能真正说明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以及文学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仅仅看到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现象,是受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规律制约的,拒绝从形式的角度进入对文学艺术问题的研究,那么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自己的“美学”。与皮埃尔·马歇雷、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特里·伊格尔顿等阿尔都塞学派的美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所不同的是,作为社会学家的托尼·本尼特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统计学等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研究阿尔都塞所提出的美学问题,注重从文化的复杂性,文化的“多元决定”关系,现代文学艺术与现代政府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关系等方面

社会地和历史地研究文学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发展了不同于前者的另外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

1981年,托尼·本尼特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一文,分析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研究和分析通俗小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显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去分析和说明文学现象并从中提出社会问题的理论特点。该文批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批判理论传统,这种理论把通俗文学简单地看作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因而事实上拒绝了对通俗文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内部(或它在处理这个范畴时所使用的语言)对通俗文学的忽视不光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本身的遗憾,也不光是政治的遗憾,而且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工程的错误理解,结果损害了构想和进行经典化文本(这种文本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纵横驰骋的领地)研究的方式。”<sup>①</sup>托尼的观点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的,因而有必要另辟蹊径,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去研究和说明大众文学的理论特质及现实意义。1987年出版的托尼·本尼特与珍妮·沃考特合作的专著《邦德及其超越》可以看作托尼·本尼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通俗小说和大众文化的一个成功例证。该书有力地证明了在英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冷战英雄”007(邦德)形象是怎样被社会地生产出来的。托尼·本尼特指出,邦德不是在一部小说或电影中构建出来的,而是在形形色色的与邦德有关的文本(如人物访谈、作家和不同的邦德演员的传记、传闻轶事等)和各种文本之间的关系中构建起来的,所以阅读邦德不是只阅读被视为自律的文学文本,而应该通过小说、电影以及其他邦德文本来感受和体验这些文本所构成的复杂的互文性关系,这种互文性关系被变化着的社会关系及意识形态影响着,在现实中发挥着复杂多样的社会作用。托尼·本尼特认为,大众文化并不简单地是一个消极的和否定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拒绝和否定大众文化,而在于真正理解它的复杂性及变化的规律,从中找到通过阐释大众文化而认识现代社会的目的。

①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向愚、陈永国、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4页。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和《新左派评论》杂志的积极推动下,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被介绍到英国,在英国左翼学术界引起了影响广泛的“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转向的实质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心转移到与文化领导权转型有关问题的研究和阐释上来。1990年,托尼·本尼特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文学之外》,全面分析和评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建设文学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困难。作为文化研究学者,托尼·本尼特与特里·伊格尔顿的不同之处在于,托尼·本尼特认为,虽然不可能存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并不排斥其他种类文学理论存在的可能性。托尼·本尼特指出,文学指称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化组织的表征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文本的意义,以及文本所产生的审美经验事实上被一系列历史的特定的制度和话语所调节,这样定义文学,文学就会被看作一系列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研究文学,就有可能建设一门崭新的文学理论,它既能把文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的组织和维持的、文本在其中使用和发挥作用的场域来进行分析,又可以坚持文学的特殊性,不至于抛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关于文学性的丰硕理论。基于在特定的历史性的制度和话语的场域中研究和阐释文学文本的学术立场,在微观的层面,托尼·本尼特发展了关于阅读的“阅读型构”理论,在宏观的和历史的层面,托尼·本尼特发展了不同于布尔迪厄关于艺术制度的理论,这就是他关于文化的治理性,即文学艺术等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机制复杂性的重要研究。在我看来,托尼·本尼特的这些研究卓有成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现象的研究,关于文化领导权问题的研究借此得以具体化、实证化并且具有了学科发展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传统中,从雷蒙德·威廉斯和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中心的研究开始,就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色彩更为鲜明的“审美意识形态”概念,而选择了理论上较为中性的“文化”作为核心概念。事实上,无论是路易·阿尔都塞、特里·伊格尔顿还是托尼·本尼特都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视野中,文化等于意识形态的概念。英国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漫长的研究历史中,除了特里·伊格尔顿 1990 年出版的以德国美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使用了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以外,其他学者在对英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中,一直都使用“文化研究”这样一个较为宽泛和模糊的概念,这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托尼·本尼特看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面对的“问题”和所依据的传统都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美学,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更倾向于从经验性的大众文化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问题,在这种经验性研究中,理论与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同于德法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方。“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的第二个优点也许就在于它的跨学科性和实证性。文化研究以大众文化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吸取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实证方法,在学理层面上比“审美意识形态”更具有实证性和可操作性,这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特性。然而,这两个方面的理由并不逻辑地证明“审美意识形态”概念是错误的,在我看来,“文化研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自己的传统中从自己的角度和立场所展开的对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的一种研究,简单地说,也可以说是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一种研究路径和一种理论模式。在对康德式美学和自律性美学的批判、对大众文化和被压迫者文化的重视,在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坚持和发展。通过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模式的分析,在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模式,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时无疑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这是在当代社会和文化制度下争取文化领导权的主体。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托尼·本尼特谈到,在文化研究中,大量对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论概括来自浪漫主义时期而不是来自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模式,知识分子习惯于把自己看作站在与权力对抗的立场上,“向权力说真话”的人(萨义德语)。托尼·本尼特认为,这种知识分子/国家权力的对立模式无法解释当代西方社会中当代知识分子角色类型的变化,以及他们与政府、社会的复杂关系。在今天,知识分子已经不是一个独



立于国家之外的自主整体,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应当只是政府的奴仆,知识分子当然需要独立的研究空间。但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空间与批判舞台并非与政府完全无关。知识分子既应该促成政府提高对文化的投入和支持,因为政府是唯一有能力代表普遍利益而行动的行为者,同时又要坚持知识分子的权利和立场,这事实上也是他们的义务,因为当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学会使用政府为其担保的反对政府的自由”的时候,必须独立于政府之外。在1998年出版的《文化:改革者的科学》、2001年出版的《区分多样性:文化政策与文化多样性》、2002年出版的《福柯:文化研究与治理性》等专著中,托尼·本尼特都坚持了这种观点。在关于文化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托尼·本尼特关于文化的复杂机制、治理性与知识分子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和阐释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注重从实践的层面,结合具体的文化政策和研究个案的剖析来阐释自己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

托尼·本尼特关于治理性的复杂性研究来自米歇尔·福柯的研究。福柯跳出了阿尔都塞理论主义的框框,从经验的角度研究和发展的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使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得以历史化和学科化。托尼·本尼特的重要贡献在于把福柯关于主体性的研究,关于治理性复杂性的研究运用于文学、艺术的有关问题的研究中来,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空间和学术视野,也为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当代文化论争和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根据。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托尼·本尼特注意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和实践型的知识分子。对立性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一以贯之的基本学术立场,它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基本武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的不合理性,以此来激发和唤起现实生活中个体的启蒙意识。正如托尼·本尼特在《批评的幻象》等论文中指出的,这种批判型知识分子由于丧失了现实中找到建设性文化动因的能力,其激进的批判姿态并没有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sup>①</sup>米歇尔·福柯关于治理性的研究以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多元决定”的理论为基础,在历史和现实的具体关系中分析和论证了“政府为其担保的反对政

① 参见本书第13章。

府的自由”的空间和可能性,福柯认为学会并且善于利用这种自由的知识分子才是在当代社会生活条件下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托尼·本尼特所说的“实践型知识分子”,他们用现实所提供的条件,根据技术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规律来推动文化领导权的社会主义转型。

我认为,托尼·本尼特本人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霍尔以及伊格尔顿等就是这种实践型知识分子的代 表。英国的文化研究起源于大学精英教育体制之外的成人教育,一直与英国工人阶级及被压迫的阶层保持着某种密切的联系。托尼·本尼特本人最初的工作也是成人教育,努力阐明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贯穿到当代文学、艺术、文化现象的理论阐释中去,是托尼·本尼特始终坚持不变的理论目标。他所领导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中心(RESRC)<sup>①</sup>是由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资助的大型国际性研究中心,也是英国第一个对文化变迁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含义进行广泛而集中研究的大型研究中心。该中心目前主要在文化经济学,传媒、文化与经济变化,文化、统治与公民,文化价值与政治,定性研究与文化统计学等几个方向上展开研究。托尼·本尼特自己的研究兴趣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 博物馆的历史与理论,历史的记忆与表征的不同系统对建构特定的存在与行为方式所起的作用;
2. 文化管理的现代形式的发展史及理论,以及它们对在不同的政权和群体语境中社会行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3. 对日常文化实践以及它们与当代阶级理论和文化政策发展所关注的内容之间的联系进行统计学和民族志研究;
4. 文化分析形式上的发展,注重吸收科学研究和“治理性理论”的观点;
5. 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之间的关系。<sup>②</sup>

托尼·本尼特在《我的学术之路和理论方法——为中国读者而写》这篇

① 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中心(RESRC)主页:<http://www.cresc.ac.uk/>。

② 关于托尼·本尼特的个人情况可登陆以下网址:<http://www.open.ac.uk/socialsciences/staff/>。

文章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英国文学批评中的伦理和社会良知传统的结合是英国“文化研究”兴起的重要原因。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坚持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的立场,在当代十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深入研究了大众文化与当代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关系,在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学理论。托尼·本尼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一是不墨守成规和理论教条,不是从文本出发而是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来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二是积极而又有所选择地吸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找到自己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新的理念、途径和方法;第三,高度重视学理的要求,虽然面对的是现实问题和现实经验,但始终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理要求和内在逻辑层面去解决问题和推动学术上的发展。我想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而言,对托尼·本尼特的译介也许是有所助益的。

是为序。

王杰

2007年7月

于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 绪论： 我的学术之路和理论方法

——为中国读者而写

在选择以《文化与社会》为本文集的标题时，我很清楚这里每一个术语的意义都存在着许多种互相冲突的解释，同时，就“社会”(society)这个词来说，它的通用性已经受到更为历史化的“社会的”(the social)这个用法的挑战。我也明白，对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解释从来就不是一致的或固定的。考虑到这两个术语都背负着巨大的理论负担，这样一种解释也是遥不可及的。但是，这恰恰就是为什么这两个术语的结合很适合成为我这本文集的标题的原因，这本文集努力从各种理论视角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视角反映了近30年来文化研究所关注问题的变化以及它与邻近学科的关系。就我自己的情况来说，这些理论视角的变化也与研究者生活中某个阶段的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当所参照的理论和政治观点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的时候。当我在1983年从英国迁居到澳大利亚生活和工作，又于1998年返回英国时，我两度经历了这种理论与

政治观点的变化。既然本文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与这两次迁移有关的、当时我所关注的和优先考虑的问题的反映,那么,在介绍本文集的每一个部分时,我将把理论思考和我的生活经历结合在一起,以方便读者对作为我不同阶段工作之基础的思想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

尽管如此,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为了更加清晰地呈现我的知识结构,有必要先做一个总体评论。众所周知,英国的文化研究最初是通过一个批判性的对话过程而形成的,以文化分析为其形式,以对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评论为其传统,随着英国文学学科的发展而发展。<sup>①</sup>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早年都受过专业的英国文学训练,都被这些文学遗产深深影响,以至于在为更加关注政治的新的文化分析形式的发展开辟学术空间时,他们既支持又反对这个传统。他们主要是通过反对“利维斯主义”——与利维斯(F. R. Leavis)和《细绎》杂志有关的文学批评学派,在这里对文学文本的批评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批评手段<sup>②</sup>,由此对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和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等19世纪批评家的遗产进行仔细检查,以便去除他们的精英主义和纯粹道德层面的反资本主义方式,代之以对“日常文化”的关注,也就是对塑造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力量的关注。<sup>③</sup> 当然,这样做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动机,希望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进而产生出动力,通过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变来促进一种共同文化的产生,这在威廉斯和霍尔那里体现得尤其明显。

① 这里的经典文本是威廉斯的著作,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8 和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1。然而,它们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其自身的观点,而且因为对大量的研究文献来说它们起着枢纽的作用。当这些文献试图将文化研究与早期的批评与思想传统联系起来时,它们从威廉斯的讨论中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

② 参见马尔赫恩在更为广阔的批评传统的语境中对利维斯著作所进行的详细讨论,这个讨论也成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F. Mulhern. *The Moment of "Scrutin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③ 尽管这在霍加特经典作品《识字的用途》(R.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 - Class Lif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ublications and Entertainment*,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7)中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它仍然处在利维斯的影响之中,表现为它对所讨论的大众文化实践所做的否定性评价。霍尔早期关于大众文化的著作——例如他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文章以及他与帕迪·沃纳尔合著的书(S. Hall and P. Whannel. *The Popular Arts*, London: Hutchinson Educational, 1964)——更加关注的是,大众文化把大众的愉悦与新左派的政治议程联系起来,从而发挥作为政治动员的场所的作用。

由于我最初自己独立写作的两本书——《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sup>①</sup>和《文学之外》<sup>②</sup>——主要关注文学和美学理论问题，所以我也经常被认为曾经受过文学研究的专门训练，在英国，这通常意味着在大学阶段学习英国文学。然而，我对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兴趣是通过一条完全不同的学术道路被培养出来的。我在大学的学习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一开始取得的是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学位。此后，我在苏塞克斯大学社会学专业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尤为关注艺术和文学社会学。这导致我在博士阶段主要研究卢卡奇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现实主义和阶级意识的概念，由此，我了解了后康德美学，特别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有关的这一传统的各种政治性变形。这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指出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由安东尼奥·葛兰西、乔治·卢卡奇、卡尔·科尔施、瓦尔特·本雅明、马克斯·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赫伯特·马尔库塞、亨利·列斐伏尔、泰奥德·阿多诺、让-保罗·萨特、吕西安·戈德曼、路易斯·阿尔都塞和卢西奥·科莱蒂等主要人员形成的理论传统。<sup>③</sup>安德森评价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个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早期著作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主要关注审美和文化分析问题，同时安德森也把这方面工作所产生的成果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最丰富的遗产。我并不是不同意这个评价，但是这个传统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美学之间关系的处理在许多方面都是严重误导别人的，这让我很震惊。尤其是当他们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发展出一种哲学美学——也就是把审美当作一种与科学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精神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不变模式来论述——时，情况更是如此。卢卡奇、戈德曼、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等人的著作都清楚地表现出这种企图。尽管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受到启蒙运动的美学观念，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并且正如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他的早期著作<sup>④</sup>中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些思想也塑造了他的异化批评理论，这些都是相当明显的事实，但是

① T. Bennett. *Form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Methuen, 1979.

② T. Bennett. *Outside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③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25-26.

④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他一些早期著作首先经过巴特摩尔的翻译在英国得到广泛流行，见T. Bottomore, ed.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C. A. Watts & Co, 1963.



在我看来，发展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努力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这些著作的一个非常惊人的方面是，在他们那里，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真理的关键最后总是存在于一个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中——对于卢卡奇来说是黑格尔，对于科莱蒂是康德，而对于阿尔都塞则是斯宾诺莎。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结果，因为同时这些思想家又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取代、置换或者重新评价了早期“资产阶级”哲学的“问题式”(problematics)。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又怎么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由它之前的一种哲学立场组成呢？第二，在我看来，把审美当作一种精神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不变模式来建构，这很难与作为一种旨在对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彻底的“历史化”的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相协调。如果精神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审美模式的结构是普遍的并因此是超历史的，而所有个人的文学和艺术实践在它们最为重要的方面又总是从根本上被确定为这个审美模式的一种独特表现，那么，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规划如何能够实现？这只能导致一种疲软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失败的唯物主义(a materialism manqué)——它只能解释这些文学艺术实践的偶然的、短暂的方面，而不是它们的本质，因为早在对它们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之前，它们的结构、准确地说，它们的审美结构已经给出了这一本质。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前面说到的这些情况只有对那些真正伟大的或权威的艺术和文学作品才是真实的、有用的，它不给“其他的文化现象”留出任何分析的空间，以便这些“其他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文本、生活方式——能够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sup>①</sup>。用我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句话来说，这里反映了一种建立“上层建筑的三位一体”(holy trinity of the superstructure)的努力，它在康德对判断力与纯粹理性及实践理性的操作之间的关系进行超验解释的

① 在1981年的著作中，我详细地讨论了这种逻辑的运作过程，见 Tony Bennett. "Marxism and Popular Fictio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1981, 7(2): 138-165.